

第九章

血腥杀伐抗日军民

义勇军余部坚持抗日

1932年末至1933年初，东北人民抗日武装斗争转入低潮，但是日伪统治者并未由此而摆脱到处挨打的局面。历史表明：东北人民抗日武装力量并没有因为日军长驱直入占领热河，继而又在华北挫败中国军队，并迫使国民政府屈辱地在《塘沽协定》上签了字，而丝毫影响斗志；相反，为了牵制日军对热河及华北的侵略行动，东北人民的抗日武装斗争规模很快恢复，并向纵深发展，准备新的斗争高潮的到来。这主要表现在：东北抗日义勇军余部继续在东北各地坚持抗日武装斗争，和中国共产党领导的抗日游击队与东北人民革命军等抗日武装的建立和壮大。

经过1932年日伪连续不断的大规模“讨伐”，东北抗日义勇军各路，特别是吉、黑两省的义勇军，确实严重受损。此后东北抗日义勇军实际是一分为三：一是在李杜、王德林、马占山、苏炳文等抗日将领领导下转进苏联；一是在黄显声、邓文、李海青、冯占海、郑桂林等抗日将领领导下，南下参加热河抗战、长城抗战和察哈尔抗日同盟军的抗战；一是在邓铁梅、苗可秀、王凤阁、孙永勤等抗日将领领导下坚持在东北各地继续进行艰苦卓绝的抗日武装斗争。

在北满，高玉山在虎林领导的国民救国军就是在原地坚持进行抗日武装斗争的重要队伍。高玉山曾任虎林县自卫团总队长，事变后追随李杜参加抗日，李杜率部入苏后，曾一度被日伪委任为虎林自卫团副总指挥，但在1933年3月1日率部起义，枪毙县参事官隐岐太郎，成立了国民救国军，而且救国军很快发展到五六千人，先后攻克虎林、饶河、抚远等县县城。高玉山救国军的胜利，引起国内外的很大关注。当时，已由苏联转道回国继续从事抗日救亡斗争的李杜、马占山和正在察哈尔进行抗战的冯玉祥等都曾派代表到虎林表示慰问和支持。与高玉山救国军相呼应而继续战斗在北满的，还有以德都山区为基地，不断出击打击敌人的张云阁部，和转战于青冈、望奎、兰西、肇东、木兰、安达一带的张锡武部。前者原属黑龙江抗日救国军第四军徐海亭部，后者原属黑龙江抗日救国军第三军李海青部。张云阁和张锡武于1933年冬和1934年10月，在对敌斗争中先后壮烈牺牲。在三江地区，由马占山和李杜任命的绥滨县长陈大凡和桦川县长张锡侯，在马、李入苏后不但坚持抗日武装斗争，而且双方会合成立了黑龙江省抗日人民自卫军。张锡侯的黑省自卫军，还与上述高玉山的吉林自卫军建立了联系，配合抗日。但在1934年初，他们在日伪疯狂“讨伐”下，被迫退入苏联。

在南满，邓铁梅、苗可秀等爱国志士的抗日斗争事迹，更是感人至深，不可磨灭的。邓铁梅系辽宁省本溪磨石峪人，1928年任凤城县公安局长，事变时正在居闲，在抗日名将黄显声的支持下，经与好友云海青密谋后，从锦州回归凤城进行抗日。由于邓铁梅在凤城、岫岩一带素有声望，所以一经串连，很快就获得300多支枪，拉起180多人的队伍。1931年10月下旬，在凤城县小汤沟顾家堡子，东北民众自卫军宣告成立，此后不到两个月，自

卫军就扩大到1500人，并于1931年12月26日夜袭凤城，致使敌人“胆战心寒”。1932年3月，设在北平的东北民众抗日救国会特派苗可秀到邓的司令部联系，此后不久邓便被救国会委任为东北民众自卫军第二十八路司令。同年4月21日唐聚五在桓仁誓师后，邓又被委任为第十三路司令。从1932年春到同年8月左右，邓铁梅部与日伪军进行的大小战斗达百余次，队伍一跃而达到15000人以上，共编为6个旅20个团，成为活跃在安东、凤城、岫岩、庄河一带的抗日义勇军劲旅。1932年深秋，唐聚五的辽宁民众自卫军遭受挫败而转进热河后，邓铁梅部也连遭“讨伐”，特别是1933年4月的“大讨伐”使邓部大受损失。然而，邓部利用随即来到的青纱帐季节使队伍得到恢复，以致在同年7、8月间十分活跃地反击了日伪的扫荡，取得了部分的胜利。进入1934年，日伪不但一再“讨伐”，而且开始推行迫使军民分离的归屯并户政策，致使部队不得不化整为零，进行小股游击活动。就在此时，邓铁梅因病不能随队活动，不久在凤城小蔡沟张家堡子养病期间被日伪便衣军警逮捕，1934年9月28日又被秘密杀害于奉天陆军监狱。在就义前，邓铁梅曾写下“五尺身躯何足惜，四省失地几时收”的壮烈词句。邓铁梅的继承者苗可秀，是地道的投笔从戎的知识分子。他以东北大学流亡学生的身份，不但参与了北平东北抗日救国会和东北民众赴京请愿团的活动，并奉派千里迢迢到辽东邓铁梅部进行工作，最后还毅然放弃复学和毕业考试的机会，参加邓部成为邓部的总参议。邓铁梅遇难时，苗可秀任少年铁血军总司令。这支部队的主要成分是，邓部的学生队，和凤城、岫岩、庄河几县的大、中、小学学生和中小学教师以及青年农民。1935年4月21日，苗可秀的铁血军进行了使日伪受到很大震动的汤沟战役。此后不久，苗可秀从凤城

向岫岩转移过程中身负重伤，后又被敌人逮捕，1935年7月25日被日伪杀害。苗可秀牺牲后，少年铁血军中的杰出青年刘壮飞、白君实等踏着先人的血迹继续前进。“九一八”事变前夕，刘壮飞和白君实还是在中学读书的青年学生，事变爆发后，1932年春他们便在岫岩师范学校内，会同其他人组织了学生团和抗日救国会。1933年1月，他们受苗可秀的委托组织别动队，刘、白分任队长和队副。同年8月别动队改为劲斗团。1934年2月劲斗团又改为少年铁血团，刘、白分任第一、第二大队长，苗可秀任总司令，共500余人。这支以知识青年为主体抗日队伍，直到1935年仍是给敌人以很大威胁的抗日劲旅。不幸的是，同年11月21日刘壮飞被另一支抗日军误击致死。继任少年铁血军总司令的白君实后来转进到深山密林之中，并以地道战与日伪周旋，直到1939年，最后壮烈殉国，时仅82岁。需要说明的是，与邓、苗、刘、李部抗日军共同战斗在辽东、辽南一带还有李春润部、阎生堂部和王凤阁部等。李春润曾在于芷山属下任参谋处长和营长，唐聚五在桓仁誓师后，李任第六路司令，活动于新宾一带。辽宁自卫军主力败退后，李春润曾去北平，被北平东北抗日救国会委为抗日义勇军第三军副总指挥，代行总指挥职权，并筹集一批军火由海路运回东北。但不幸于1933年8月在对敌斗争中，身负重伤，后牺牲。阎生堂领导的“老阎队”是活动于安东南部地区的抗日武装。李春润从海上运回一批武器弹药后，阎在李的指挥下曾进行多次战斗。1935年“老阎队”发展到300多人，同年12月被编入少年铁血军，为该军的第一路军。1936年阎生堂部向宽甸、通化一带进发，与中国共产党领导的抗日联军取得联系。但是，1936年12月，正在进行分散活动的阎生堂，在凤城沙里寨北尖山沟被敌人包围，负伤后牺牲。王凤阁更是最终为国捐躯的民族英雄。

他本来是奉军的一名下级军官，事变后同原辽宁陆军步兵第二团副孙秀岩密谋抗日大计。1932年4月，他在通化、临江的交界处组成了辽东民众义勇军，并于5月8日一举攻克了柳河县城。之后，王被唐聚五的辽宁民众自卫军委为第十九路司令，全路共3000余人，后又被任为第三方面军总指挥，统辖海龙、柳河、金川、辉南等县近万名抗日武装。1932年10月，唐聚五乔装赴平，部队转进热河时，王凤阁主张枪不离人，人不离乡，率部数百人回归到果松川、大罗圈沟一带，坚持抗日武装斗争。那里是临江、通化、辑安的交界处，山岭纵横，地势险要，从1933年夏到1936年冬，王凤阁抗拒了日伪的多次“讨伐”，保存和壮大了自己。王凤阁部当时不但与辽东三角地区的苗可秀的少年铁血军保持密切联系，而且同杨靖宇的抗日队伍和金日成的朝鲜人民军相互支援，相互配合，不断打击敌人。因而王凤阁与抗日联军的将领共同被日伪列为“讨伐”的主要目标。

辽西抗日义勇军，1932年遭受两次日伪的“大讨伐”，1933年春日伪进攻热河前后，大都西进参加热察的抗日斗争。值此之际，辽北和吉林的几股抗日义勇军，为配合热河作战，开进辽西热边，继续进行抗日武装斗争。他们是：辽北义勇军贾秉彝、刘翔阁部，吉林抗日救国军第十六旅田霖部，和辽宁民众自卫军留守部队英若愚部。他们曾于1933年4月2日攻克阜新，4月下旬又攻克康平，生擒日本参事官南竹次。但在同年7月，在敌人的“讨伐”中，田、英、贾三部被分割，失去联系，并且田霖不幸中弹身亡，英、贾两部也受挫而退向关内。代之而继续在辽西一带抗击日本侵略者的是原辽西抗日义勇军高鹏振部。高鹏振即“老梯子”，绿林出身，事变后毅然走上抗日道路，1931年9月就组成了200多人的救国军，不久部队就扩大到2000余人，后被

纳入东北抗日救国义勇军第四路耿继周部，为该部的第二团转战辽西各地，成为辽西义勇军驰名的有力之旅。辽西各路义勇军西进热河后，高鹏振决心留在热辽边境继续战斗，从此高部转战于法库、新民、阜新、彰武一带达5年之久。1937年6月高鹏振却死于叛徒手下。热河沦陷后在当地开展对敌斗争的杰出代表，是孙永勤的抗日救国军。孙永勤系热河省兴隆县人，曾任黄花川自卫团的团总。热河沦陷后，他目睹日本侵略者的野蛮残暴和汉奸亲日派的厚颜无耻，决心奋起抗日。恰好中共冀东特委派人到黄花川一带，号召群众起来武装抗日，孙永勤颇受影响。1933年12月10日以孙永勤为首的民众军正式宣布成立。孙永勤义勇军的诞生，受到中国共产党重视与支持，中共京东特委派20多名共产党员参加孙的民众军。由于民众军在热南连战连捷，各地民团和山林队纷至沓来，队伍很快扩大到5000人左右。1934年5月，民众军接受中共京东特委王平路的建议，改称抗日救国军。由于部队经过整编，战斗力提高，连续攻克许多伪军据点。1934年8月日军诱降孙永勤，遭孙的拒绝后加紧对孙部围剿，1935年2月遭敌人重兵包围，突围后被迫进入冀东“非武装区”。在那里，遭到数以万计的日伪军的猛烈围剿，孙永勤壮烈牺牲，其领导的救国军全部殉国，时为1935年5月下旬。

红色抗日游击斗争

东北抗日义勇军的可歌可泣的英勇抗日斗争，其意义是巨大的，他们以鲜血和生命展示了中华民族坚决反抗侵略的无畏斗争精神。同时，它也为继之而起的中国共产党领导的抗日武装做了组织上的准备，并从正反两方面提供了斗争经验。但是，共产党

所领导的抗日武装并非是抗日义勇军的直接继承者。从时间方面看，共产党所领导的抗日武装几乎是与抗日义勇军同时建立的。

“九一八”事变后，中共中央多次发表声明，坚决反对日本帝国主义侵占我国东北，明确提出“组织东北游击战争，直接给日本帝国主义以打击”的战斗任务。当时，设在东北的满洲省委虽然还不能完全摆脱中央的冒险主义的错误领导，但是罗登贤等满洲省委领导人能够从当地的实际出发，清醒地把努力开展和领导抗日民族战争，作为党的中心任务。很明显，在日本帝国主义直接武装占领的情况下，一般的罢工、罢课以示反抗，是无济于事的。因此，中共满洲省委除与原已在抗日义勇军中的共产党员保持联系外，陆续增派一些人到各地从事抗日武装的创建工作。磐石游击队是中国共产党在南满地区最早建立的抗日武装。因为早在1930年8月就建立了中共磐石县委，继而又成立磐石中心县委，所以在“九一八”事变后，磐石地区受党领导和影响的反日会、农民协会、妇女会等抗日群众组织纷纷建立，并连续多次进行大规模的反日锄奸斗争和示威运动，从而极大地激发了群众的抗日热情。1932年1月起，中共满洲省委先后将张振国、杨君武、杨林等^①派往磐石，一方面做义勇军的工作，一方面加强对创建游击队工作的领导。当时磐石中心县委已拥有一支小型武装，名为“特务队”，队长李红光，它是1930年建立的，主要任务是锄奸御敌，故亦称“打狗队”。1932年6月4日，磐石工农反日义勇军正式成立。此后，该军先后与抗日军“常占队”合并和以“五洋队”之名开展抗日活动。1932年11月，满洲省委为加强南满党

^① 张振国又名张玉珩，时任吉林市特支书记。杨君武又名杨佐青，原任中共北满省委兵运工作负责人。杨林时任满洲省委军委书记。

和游击队的领导，特派省委军委代理书记杨靖宇到南满巡视。在杨靖宇的指导下，工农义勇军经过整顿和改编，改名为中国工农红军第32军南满游击队。1933年1至5月，这支游击队与敌人作战30多次，粉碎敌人4次“讨伐”。在这种形势下，驻烟筒山的伪吉林警备军第五旅第十四团迫击炮连，在共产党员曹同安、宋铁岩、张瑞麟等人的组织下举行起义，加入了南满游击队。南满地区的另一支由党创建的抗日武装是海龙游击队。这支队伍是中共海龙县派10名党员和爱国青年到辽宁民众自卫军第九路军工作后，从自卫军拉出来的，原称海龙工农义勇军。1933年1月，杨靖宇从磐石到海龙，整顿了海龙工农义勇军，并将其改称中国红军第三十七军海龙游击队。同年秋，该部又与中国红军第三十二军南满游击队会合，形成为由杨靖宇领导的拥有2000余人的抗日队伍，活动于磐石、永吉、桦甸、辉南、通化、柳河、海龙、东丰、西丰、伊通、双阳等县，是南满地区抗日武装的骨干力量。包括延吉、和龙、珲春、汪清、安图、敦化等县的东满地区，也是早有党的组织和事变后抗日群众组织林立和抗日群众斗争高涨的地区。1931年10月东满特委就派人在那里筹备建立抗日游击队，11月满洲省又派童长荣到东满任特委书记，以加强领导。1932年，延吉、汪清、安图、珲春、和龙等县先后都建立起游击队。1933年1月，童长荣把这些游击队合编为拥有200人的东满游击队。王德泰任大队长，每县游击队编为中队。后来这支游击队扩大到1000人，活动地区由图们江、雅河一带发展到图佳和敦图铁路沿线，并建立了东满游击根据地。吉东相当于今日之黑龙江省牡丹江地区。事变后那里成为李杜的吉林自卫军和王德林吉林救国军互相配合进行抗日武装斗争的重要地区。满洲省委不但在那里建立了由其直接领导的宁安、饶河两个中心县委，而且于1932

年4月特派军委书记周保中到吉东工作。与此同时，党的组织还派大量党员加入自卫军和救国军。1933年5月还成立了中共吉东局。就在吉东局成立前后，由密山、宁安和饶河等几支游击队构成的吉东游击队应运而生。以李延禄为总司令、孟泾清为政治委员的密山游击队，是王德林救国军溃散时，以党秘密掌握的救国军补充团为基础建立的。改编后经过多次战斗，向密山转移。宁安游击队是周保中到宁安地区对自卫军和救国军进行工作后，1933年5月将李荆璞率领的“平南洋”总队改编成立的，当时称为宁安工农义勇队。后来，周保中将其领导的王德林救国军残部、柴世荣等所属各部，与宁安工农义勇队合并，组成绥宁反日同盟军。1934年5月20日，又决定组织宁安游击队，队长为白殿贞。饶河游击队原称饶河反日游击队，是以救国会为基础建立的，由崔石泉、金文亨领导，原与陈东山、高玉山等救国军统一行动。1933年6月，陈、高救国军瓦解后才独立出来。北满的几支游击队中，首先是巴彦游击队，它是中共党员原清华大学学生张甲洲发动东北籍同学回东北建立的，名为东北工农义勇军江北骑兵独立师，师下设两个中队，约200余人。1932年6月末，满洲省委派军委书记赵尚志到该部进行工作。后赵尚志任该部参谋长。同年8月，巴彦游击队会同邻近的抗日军才洪猷部围攻了巴彦县城后，部队扩大到700余人。但是，1932年末，由于执行党的北方会议所决定的实行土地革命的冒险主义方针，部队失去群众支持，最后离散。汤原游击队也是北满游击队中的一支，它是1932年夏满洲省委秘书长冯仲云赴汤原后着手建立的。那里也是党的组织设立较早，群众抗日斗争高涨的地区。但是，汤原游击队是历经坎坷的：第一次，1932年10月中共汤原中心县委在反日同盟会的基础上建立的汤原游击队，竟被土匪“荣好”缴了械；同年冬第二次建立的

汤原游击队，发生了兵变。总结前两次的教训，1933年冬在县委书记夏云杰领导下，第三次建立了汤原反日游击队，戴洪宾任队长，夏云杰任政委，队伍很快发展到600余人。后来又有张传福的伪自卫团和冯治刚率领的矿警队加入，汤原游击队扩大到2000余人，活动在汤原、萝北、通河、依兰、桦川、富锦一带。北满游击队还包括珠河游击队，亦称哈东游击队。1933年初满洲省委派赵尚志到哈东义勇军孙朝阳部工作。赵以马夫身份提议攻击宾县并亲自带队攻克了宾县县城，于是被提拔为参谋长。同年秋，孙部溃散后，赵尚志率人携械到了珠河，在珠河县委领导下，在该县三股流成立了珠河反日游击队，赵任队长。1934年春，珠河游击队攻克珠河镇，大破黑龙宫，三次围攻宾县城，并争取了部分伪军反正，队伍扩大到400多人，被编为东北反日游击队哈东支队，赵尚志任支队司令，张寿篈（即李兆麟）任政治委员。他们还在珠河建立了抗日根据地，成为一支抗日劲旅。

不过，从总体上看，中国共产党创立和领导的几支抗日游击队，力量还比较薄弱，还未成为东北抗日武装斗争的主力 and 中心。但是，与抗日义勇军的江河日下的态势相反，党的抗日游击队呈现着发展和上升的可喜趋势。特别是1933年1月26日中共中央《给满洲各级党部及全体党员的信》，即所谓“一·二六指示信”传达贯彻后，由于在很大程度上克服了左倾冒险主义，停止土地革命，建立广泛的抗日民族统一战线，东北人民的抗日武装斗争迅速改观，走向新的高潮。从组织和队伍方面来说，从1933年夏到1936年初，在10多支游击队的基础上建立了东北人民革命军第一军至第六军。相应地，各军都建立了根据地，扩大了游击区，把东北人民抗日游击战争推进到了一个崭新的阶段，不断地打击和动摇着日本帝国主义利用伪满洲国所进行的殖民统治。

由杨靖宇任军长兼政治委员的东北人民革命军第一军，是在南满游击队的基础上，于1934年11月7日正式成立的。中间还经过东北人民革命军第一军独立师的阶段。而且在1933年9月18日独立师成立之前和以后，都曾同其他各路抗日军建立联合作战组织。到1935年10月，第一军已发展到5000人，活跃在南满以至东满；根据地设在柳河、通化、浑江的交界金川河里，在河里根据地群众抗日热情的影响下，南满各游击区建立了300多个农民委员会，15个乡政府，56个区政府，还在辉南石头河子成立了南满特区人民革命政府。

东北人民革命军第二军于1935年5月30日正式成立，军长王德泰，政治委员魏拯民，共1200余人。前此，1934年8月也曾建立东北人民革命军第一独立师，它把原东满延吉、和龙、汪清、琿春4县游击队合而为一。第二军的游击活动地区与第五军有交叉。其第一师转战于安图、敦化、额穆、桦甸、抚松等地，其第二师大部分与第五军一起行动，小部分在汪清、琿春一带坚持斗争。

哈东游击队在同敌人的周旋中迅速壮大，1934年底已拥有队员450余人，并与10多支其他抗日军建立了联合抗日司令部，游击区也从珠河1县扩大到周围6县。根据满洲省委的指示，1935年1月28日在珠河铁路南三股流，哈东游击队扩编为东北人民革命军第三军，军长赵尚志，政治部主任冯仲云。第三军活动在珠河东北部和中东路沿线的方正、延寿、宾县、阿城、五常、双城一带，直接威胁着北满政治经济中心哈尔滨，敌人的“讨伐”异常频繁与残酷。1935年9月，根据珠河中心县委的决定，赵尚志率主力向下江的依兰、勃利、通河、汤原等地转移。在那里，第三军会同第四军李延禄部及谢文东部、李华堂部，打击敌人。

1936年4月初,赵尚志又率主力西征松花江北岸的通河、巴彦、木兰、东兴、庆城、铁力、海伦等县。此时,第三军基本队伍已发展到1500人,加上收编的队伍,共达6000人。活动区域为松花江两岸的20余县,在深山和河谷建有4处带有根据地性质的密营。

东北抗日同盟军第四军是以原抗日救国游击军司令李延禄为首建立起来的。1933年7月下旬,李延禄在密山郝家屯召开了反日山林队联席会议,决定建立统一指挥机构东北人民反日革命军,平时分散独立活动,战时统一指挥联合行动。1934年9月以此为基础组成东北抗日同盟军总司令部,李延禄任总司令。同年12月按吉东特委统一部署,同盟军正式定名为东北抗日同盟军第四军,军长李延禄,政治部主任何忠国,共200余人。1935年秋,第四军发展到2000余人,活动地区扩及穆稜、林口、密山、勃利、宝清、依兰、方正、虎林、饶河等地。

东北抗日同盟军第五军,是1935年2月10日,由绥宁反日同盟军改编而成,周保中任军长,柴世荣任副军长,辖两个师,共900余人。该军主要以八道河子为根据地,在宁安境内活动。1935年夏,第二军第二师来宁安,配合第五军开展游击战争。该师遂由第五军指挥,第五军后来又派陈翰章代理该师师长,主要活动于宁安、额穆、敦化一带。

东北人民革命军第六军,于1936年1月30日由汤原游击总队扩编而成,军长夏云杰,政治部主任由张寿篈代理,冯治刚任参谋长。^①

^① 关于抗日游击队和东北人民革命军的阐述主要参考:军事科学院军史部著《中国抗日战争史》上卷,解放军出版社1991年版;抗联史编写组《东北抗日联军斗争史》,人民出版社1991年版。

日军分散配置与季节大“讨伐”

《塘沽协定》签定后，从1933年6月起，关东军转过头来全力以赴，以武力围剿东北人民抗日武装力量。至于日伪的兵力部署和战略战术，归根结底是以抗日武装力量的发展变化为转移的。根据关东军的统计，如下表所示，1932年9月东北抗日武装总人数达21万人，至1933年3月日伪进攻热河时减少到6.6万人，但到《塘沽协定》签定后的1933年的5月和6月，重又增长到10.5万人，相当于1932年初期和年末的水平。尽管如此，大集团的武装抗日斗争，已经让位给分散的、小集团的游击战争。据统计，1932年10月，拥有500人以上的大抗日武装集团共有151个（不含热河省），而到1933年10月只剩36个（含热河省的11个），即减少了115个团。大武装集团的减少，意味着小武装集团的增加。一旦遇到一齐“讨伐”，他们就逃进深山或高粱地里，然后再重新集结，进行袭击，充分发挥行动的机动性，必要时也可以汇合成为二三百人的大队伍，进行作战，给日伪以巨大威胁。此时虽然不像1932年那样，连奉天、新京、哈尔滨等日伪统治中心都屡遇威胁，但是攻击敌人据点以至县城的事件层出不穷。仅在1933年夏各县城即受到72次攻击，其中被攻克者为7个县城。^①面对这种态势，关东军也一改其以大武装抗日集团为目标的大规模讨伐作战的战略战术。从1933年6月起，关东军实行分散配置，采取全面分头出击的战术。当时，第十师团分布在哈尔滨、吉林方

^① 加藤肇隆著，《满洲国警察小史》，满蒙同胞援护会爱媛县支部发行，第36页。

1932~1936年东北抗日武装力量演变状况

单位：千人

年 月	抗日武装人数	备 考
1932年1月	62.0	
2	75.3	
3	100.0	
4	115.0	
5	156.0	
6	178.0	
7	183.0	
8	137.0	
9	210.0	
10	135.0	东边道讨伐
11	111.0	吉长奉挠康平法库地区讨伐
12	86.0	三角地带讨伐呼伦贝尔作战
1933年1月	84.0	
2	73.2	
3	66.0	进攻热河
4	63.8	
5	105.0	
6	105.0	
7	94.0	东边道、三角地带奉吉省讨伐
8	95.0	同上
9	95.0	
10	62.0	吉林省秋季大讨伐
11	66.0	同上
12	56.0	

续1表

年 月	抗日武装人数	备 考
1934年1月	35.0	
2	24.0	
3	18.4	
4	23.5	
5	26.5	
6	28.3	
7	28.6	
8	33.0	
9	45.0	
10	40.0	
11	32.0	
12	25.0	
1935年1月	21.0	冬季讨伐
2	22.0	同上
3	21.0	
4	27.0	
5	27.0	
6	27.0	
7	28.0	
8	29.0	
9	28.0	秋季讨伐
10	21.7	同上
11	20.0	同上
12	19.0	

续2表

年 月	抗日武装人数	备 考
1936年1月	13.5	冬季讨伐
2	15.0	同上
3	17.0	
4	20.0	
5	18.9	
6	16.0	
7	16.0	
8	19.9	
9	18.0	
10	13.0	秋季讨伐
11	12.0	同上
12	10.0	

注：该统计数字偏低，参照其他资料，约为实际数量的三分之二。

资料来源：1937年5月关东军参谋部编《最近满洲国的治安》。

面，第十四师团分布在齐齐哈尔方面，第六师团分布在承德方面，第八师团分布在锦州方面，骑兵集团分布在海拉尔方面。至于独立守备队，它原来就是分散配置的。不但师团、旅团分散配置，联队以下也实行分散配置。当时日伪已将大部分县旗政权夺取到手，因而每个县旗几乎都派驻了日军的大队和中队。伪军也按关东军的要求，实行分散配置，但由日军指挥。和日伪军的分散配置相适应，从伪满中央和地方县旗层层设立由关东军直接操纵控制的所谓治安维持会，妄图使“与满洲国治安工作有关系

的各机关……最大限度地发挥其全力”。^①当时，作为围剿、

“扫荡”抗日武装的手段，“有讨伐，有招抚，有政治工作。但军队恢复治安的唯一无二的手段是讨伐。”^②因此，关东军在

《塘沽协定》签定后，“用其主力，专事满洲国内的治安恢复”。他们以为，这样做只用几个月或半年时间就将达到目的。

因此，与日伪军分散配置相适应的各级治安维持会，原来规定同年10月即行撤销。事与愿违。如关东军的统计所示，抗日武装虽然

有所减少，但未消灭。“反满抗日武装势力数量是减少了，但质量却精锐化行动更活跃化了，也比较具有了思想性。”^③因此，

1934年日伪军的分散配置继续实行，但自同年4月兵力配备原则有所调整，即以县或几个县为单位，将部分兵力分驻于特定的专

守要地，其余兵力集中作预备队，机动进行“讨伐”，这叫作集团配置，日伪军均如此。不管是分散配置还是集团配置，其采取的

战术，均称之为“绝对讨伐主义”，即实行多方面的连续不断的“讨伐”。目的是使抗日武装部队陷入“不安、恐怖和悲观”之

中，并使支持抗日武装斗争的广大群众“感到威严”。^④至于其打法，“多半以头目为目标彻底进行”。^⑤也就是首先将抗日部队击

溃，然后对溃散的队伍，以为首者为主要目的，逐一消灭。据统计，1933年7月至10月，光是伪军就对东边道的抗日游击队和王

① 1933年6月13日在中央治安维持会第一次委员会上委员长（关东军参谋长）的致词。《日本帝国主义侵华档案资料选编》，第4卷“东北大讨伐”，第7页。

② 1933年6月13日关东军实施的“扫匪”手段概要。《日本帝国主义侵华档案资料选编》第4卷“东北大讨伐”，第5页。

③ 加藤登雄著《满洲国警察小史》，第88页。

④ 1933年11月2日吉林派遣员松岛颯托：《关于间岛共产匪认识之件》，日伪档案，171-3——41。

⑤ 1933年6月13日关东军实施的“扫匪”手段概要。《日本帝国主义侵华档案资料选编》，第4卷“东北大讨伐”，第5页。

凤阁、毛作彬、殿臣等抗日军，就“讨伐”了230余次。^①同年10月中旬至11月中旬，吉林省的全部伪军，黑龙江省伪骑兵第一旅、第三教导队、伪靖安军炮兵队、伪新京骑兵旅等，共3.5万人，在吉林省各地同时出动，进行全省“大讨伐”。在这之前，同年7月起，进行了为期两个月的第三次三角地带的“讨伐”；在这之后，1934年1至5月，和6至11月，又分别进行了第四次三角地带“讨伐”，和第四次东边道“讨伐”。这些“讨伐”都是实行分头反复出击和逐一消灭的战术。

除上述各次“讨伐”外，1934年秋已开始进行季节性大规模“讨伐”，并继之以反复多次进行的局部“讨伐”。然而，抗日武装力量不仅没有减少，反而呈增涨之势。1935年8、9月比1934年3月，东北抗日武装总人数增加1万人。出现这种势态的原因很简单：中国共产党所领导的抗日武装发展壮大，正在成为抗日武装斗争的中心与主力。^②1935年各支抗日游击队已经发展为东北人民革命军或东北抗日同盟军。本来自1934年起，关东军力图从武装镇压中抽身，便令更多的伪军伪警参加武力“讨伐”，实行“以华制华”。针对1935年的新情况，关东军重又大规模地赤膊上阵，集中日伪的暴力机关，实施综合性的季节“讨伐”。此时关东军仍在重申其“治安第一主义”，和“皇军”的“骨干”地位。但是，他也承认，过去的“讨伐”，“虽收到了相当的成果，但仍未能轻易地达到消灭匪徒的目的”。“特别是共产思想之影响日益扩大和加深，实乃治安维持上极为忧虑之事。”当

① 《省政汇览》，奉天省篇，第578～582页。

② 据1940年关东宪兵队司令部《满洲共产主义运动概史》载，1933年，原东北军余部及王德林等部为25000人，中共领导的基干武装为2220人，1935年则分别为7900人和9200人。

时，抗日武装的主力活动于南满铁路以东、大松花江以南地区，特别是山区僻地早已成为抗日根据地。关东军还认识到，抗日武装与一般民众的关系“是极为良好的”，他们说“并不像我们所认为有不共戴天之仇，甚至可以说，三千万民众在精神上与匪贼无大差别者为数不少，大多数的民众还没有与匪贼完全分开，如果进行精神上争夺，假定匪数有三万，精神上的匪军之友军，不知有几倍或几十倍。这些匪贼精神上的友军，虽不敢持枪反抗我们，却是扶育匪贼之母体。历来讨伐效果不大的最大原因，就在于此。”^①这是事实。正是这个事实，促使日伪日甚一日地加紧血腥的武力“讨伐”；正是这个事实使日伪把武力“讨伐”和政治镇压紧密结合起来；也正是这个事实使日伪把“讨伐”镇压的所谓“治标”和各种政治工作即所谓“治本”，全都列为所谓“治安肃正”的内容。

从1935年9月起，关东军在全伪满实行“秋季治安肃正工作”。关东军“统一指导”，“讨伐”由“日满军警一体”进行，“其他各项政治工作，则以满洲国各机关为主体”进行。因此，整个“肃正”期间，武力“讨伐”与下列“治本”措施同时并举：调查户口、收缴武器、推行保甲制度、强化自卫团的训练、建立“集团部落”、建设警备道路和通信网，妄图所谓“彻底肃清被匪贼污染的地区”。此次行动亦有重点，即伪滨江、吉林、奉天、安东、三江等5省。显然，那里正是东北人民革命军和抗日同盟军的活动地盘。“特别是对思想匪、政治匪，以军（指日军）之主力进行剿灭，自九月下旬开始行动，以三毛部队

^① 关东军参谋部《关于昭和十年度秋季治安肃正工作概况》。《日本帝国主义侵华档案资料选编》，第4卷“东北大讨伐”，第11～16页。

为基干之部队，担任安东省及奉天省三角地带和东边道等方面的讨伐；以尾高部队为基干之部队，担任京图线沿线地区之吉林、间岛两省方面的讨伐；以岩越部队为基干之部队，担任滨绥线沿线地区以北至大松花江间之地区的讨伐；川岸部队向锦州方面，灌谷部队向齐北线；儿玉部队向洮南西部及通辽西部地区，分别担任讨伐任务。总之，以日、满军之大部分从事全满的肃清工作。”在为期3个月的“讨伐”中，共出动作战600次，抗日武装遗弃尸体4646具；同时还逮捕3554人，其中包括所谓“政治匪”50人，“思想匪”261人，“通匪者”227人，“影响治安者”2209人。^①这只是“秋季肃正”的屠杀、镇压情况，如再加上“冬季肃正”，到1936年3月，日伪军在“讨伐”中打死、打伤、俘虏和诱扣抗日军人员12425人，再加上日伪警察宪兵逮捕者，共30000余人。^②其中包括大量的抗日爱国者和一般普遍群众。

日本侵略者在大力围剿抗日武装的同时，大规模屠杀无辜，并非始自此时，也不是全伪满的季节大“讨伐”仅有的事情。在1935年秋季大“讨伐”前不久，同年5月末，关东军第三十八联队在吉林省舒兰县境内的老黑沟（现改为榆树沟）制造了屠杀1017名群众的大惨案。关东军的这支部队，1934年至1936年是驻在齐齐哈尔的，1935年5月30日，被调到老黑沟的青顶子一带讨伐。这次行动属于1935年春季“讨伐”。从地区上看，“讨伐”的目标应是东北人民革命军第二军、第三军及其他抗日部队。当时，由东川少佐指挥的第三十八联队1000余人，兵分两路，在安

① 关东军参谋部《关于昭和十年度秋季治安肃正工作概况》。《日本帝国主义侵华档案资料选编》，第4卷“东北大讨伐”，第11~16页。

② 1936年5月19日伪中央警务统制委员会《第一回中央委员会议事要录》，中警委第103号。

图消灭抗日军的同时，有计划地屠杀无辜群众。老黑沟是一道山沟，中间有一条呼兰河，惨案发生的那一年，这条河水都被群众的鲜血染红了。沿这条河上溯达山沟的最高点桦曲顶子，大屠杀便从这里开始，接着又在北大泡、胡家店、月牙泡、桂家、柳树河西边等处进行屠杀，屠杀持续5天（另一说是八九天）。以上6处共屠杀980人，加上个别被屠杀37人，共1017人。日军为了集中杀人，用刺刀把居民群众威逼到一块儿，每个人双手用铁线上绑打紧，再从两臂中间穿上一根水曲柳杆子，每根杆子能穿上20人左右。集体屠杀地之一就是青顶子月牙泡。据目击者说，当时泡子里、泡子沿的这里那里到处是尸体。上半身在水中，下半身在外倒立着的，全身泡在水中、头部搭在岸边的……。直到今天人们在泡子里打渔，还有时打出人的骨头。

在1935年秋、冬季大“讨伐”后，1936年7月，在伪通化省柳河县又发生了白家堡子惨案。这桩罪行是驻辉南朝阳镇的独立守备兵第五大队第一中队犯下的。这个中队在中队长中山八郎的指挥下，为“讨伐”抗联一军杨靖宇部进入柳河县大荒沟白家堡子附近，结果遭到抗联青年队的伏击，10余名日兵被击毙，于是迁怒于老百姓，用屠杀无辜进行血腥报复。1936年7月15日（旧历5月27日），日军大队人马“将白家堡村围得水泄不通，把全村居民不论男女老幼，连吃奶孩子都在内，一个不漏地，像赶羊群似的赶到大荒沟警察署内（与白家堡村相距约十里），不问青红皂白，每十数人分为一组，用铁丝和绳子绑在一起。此时

① 石切山、英彰：《日军血洗老黑沟——吉林省特大惨案调查记》。吉林省政协文史资料委员会编，《吉林百年》，上卷，吉林人民出版社1990年版，第250～258页。该报告原载1989年2月12日日本《朝日新闻》杂志。

正是早晨，天空还下着濛濛细雨，被绑上的男女老幼一串一串地被赶到大荒沟警察署东南山根底下，密集在一处，然后用机关枪扫射，展开残忍无比的集体大屠杀。枪声一响，人们东挣西撞，挤成一团，弹丸比雨点还密打到人们的身上，就是铁铸的也会被穿得稀烂。”“屠杀之后，鬼子叫警察抓民伕挖了九个大坑，将尸体给埋掉了。埋后，警察署白署长和民夫在警察署说，他们在埋尸体时，经过清点，共杀了三百六十八名。白家堡子被鬼子放了一把无情大火，烧得片瓦无存。”^①白家堡子惨案亦称大荒沟惨案，惨案发生后的1936年9月东北抗日救国会曾发表“告民众人士书”，揭露日军的滔天罪行。“告民众人士书”说，当时曾有26名青年妇女进行对抗，日军用4挺机枪向群众射击，目睹惨状的日兵竟还高声怪笑。^②

东北抗日联军建立

从关东军分散配置到季节性全面大“讨伐”，经过两年多反复而残酷杀伐，各路抗日军虽然遭受严重损失，但是他们并没有被歼灭，而且经受艰难的战争洗礼后，他们显得更加精锐和坚强。特别是中国共产党所领导的抗日武装，已由抗日游击队过渡到人民革命军，又由人民革命军发展为东北抗日联军。东北抗日联军的诞生，标志着东北人民抗日武装斗争，再一次推向新的高潮。这种形势的到来，与全国抗日救亡运动空前高涨直接相关。

① 1951年9月25日赵珩检举书，并参考1955年4月19日木村正二揭发材料。此2件载《日本帝国主义侵华档案资料选编》，第8卷“东北历次大惨案”，第52～54页。

② 吉林省社会科学院存日文档案抄件，公114，2～27。

1935年夏，日本帝国主义制造的华北事变达到高峰，他们逼迫中国国民政府同其签定“何梅协定”，妄图推行华北自治，不战而取全华北。值此民族危机严重关头，同年冬在北平发生了著名“一二·九”运动，它把全国的抗日救亡运动推向空前的高潮，并对后来的全民族团结抗日局面的出现，起了不可磨灭的历史作用。在这之前，1935年8月1日中共中央和苏维埃政府发表了《为抗日救国告全体同胞书》，即所谓“八一宣言”，重申了中国人民团结起来一致抗日的主张，号召全国建立广泛的抗日民族统一战线，组成全国统一的抗日联军、统一的抗日联军总司令部和全国的国防政府。稍前一点，1935年6月8日，中共驻共产国际代表团经中共吉东特委发来《给满洲负责同志秘密指示信》，简称“六三指示信”，其基本精神与“八一宣言”是一致的。根据这些文件精神，经过充分酝酿，1936年2月，以杨靖宇、王德泰、赵尚志、李延禄、周保中、谢文东和汤原游击队、海伦游击队的名义，发表了《东北抗日联军统一军队建制宣言》。从此，至1937年10月，东北人民革命军及其他抗日部队陆续改编为东北抗日联军第一至十一军。由于在这之前，1936年1月满洲省委被中共驻共产国际代表团撤销，所以新成立的抗日联军，分别受中共南满省委、东满省委和北满临时省委领导。

1936年7月初，中共南满特委在金川县河里后方根据地召开了南满党第二次代表大会。会议正式宣布东北人民革命军第一军改编为东北抗日联军第一军。杨靖宇任军长兼政委、宋铁岩任政治部主任、安光勋任参谋长。下辖3个师和教导团。第一师，程斌任师长兼政委；第二师，曹国安任师长兼政委；第三师，王仁斋任师长，周建华任政委。抗联第二军的诞生早于第一军，是1936年3月上旬，在中共吉东特委和第二军领导干部的安图后方

基地迷魂阵会议上，决定由东北人民革命军第二军改编而成的。军长王德泰、政委魏拯民、政治部主任李学忠、参谋长刘汉兴。下辖3个师和教导团、少年营。第一师长安凤学，第二师长史忠恒（陈翰章代），第三师长金日成、政委曹亚范。抗联第一、二军成立后，1936年7月两军即合编为抗联第一路军，并成立总司令部。杨靖宇任第一路军总司令，王德泰任副总司令，魏拯民任总政治部主任。第一路军下辖第一军和第二军，共6个师。即第一军的第一、二、三师，第二军的3个师改为第四、五、六师。会议还研究了第一路军的战斗方针和任务，决定以第一军军部率第一、第三师西征辽西、热河，谋求同关内红军和中共中央取得联系；以第二军军部率第四、第六师，在原第一军游击区内，会同第二师坚持斗争，开辟长白山游击根据地，第五师留在东满和绥宁地区，配合抗联第五军继续开展抗日游击战争。为统一领导抗联第一军和东南满的抗日斗争，会议决定将中共南满特委和东满特委合并组成中共南满省委，魏拯民任省委书记，杨靖宇、王德泰等11人任委员。从此抗联第一路军西征东战，将东南满的抗日游击战争推到了高潮。西征，1936年6月和11月先后进行两次，虽未成功，却扩大了抗联的活动区域和影响。转战于东南满的第一路军各部，1936年8至12月，先后胜利地进行了攻打抚松县城、进攻安图东清沟和伏击长白七道沟等战斗，给敌人以很大打击与威胁。抗联也受到很大损失，在这些战斗中，军政治部主任李学忠、第二师师长曹国安和第一路军副总司令兼第二军军长先后不幸牺牲。总之，从第一路军编成到1937年7月，在大约一年的时间内，共进行大小战斗近百次，歼灭日伪军数千人，游击区扩大到10多县，部队发展到逾万人，严重威胁着日本对东南满的殖民统治。日本一篇回忆录曾称，抗联第一路军活动区

“东边道治安极坏，被称为满洲之癌”。^①

抗联第五军成立也比较早。1936年2月，中共东满特委书记、第二军政委从苏联回到东北，在宁安南湖头召开会议。会后，反日联合军第五军被改编为抗联第五军。军长周保中，副军长柴世荣，政治部主任胡仁，参谋长张建东。下辖2个师：第一师长李荆璞；第二师长傅显明。1936年3月，活动于密山、勃利、穆稜、虎林、饶河一带的东北抗日同盟军第四军改编为抗联第四军。军长李延禄，参谋长胡伦，政治部主任黄玉清。下辖3个师：第一师师长李延禄（兼）；第二师师长郑鲁岩；第三师师长李天柱。同年7月，在富锦南部山区活动的原吉林自卫军第二旅余部，被编为抗联第四军第四师。抗联第七军是在抗联第四军第二师的基础上，于1936年11月改编而成，其前身是1933年6月成立的饶河反日游击队。抗联第七军军长陈荣久，参谋长崔石泉。第一师师长陈荣久，第二师师长李学福，第三师师长景乐亭。为统一领导吉东地区的抗日斗争和抗联各部，于1937年3月10日成立了中共吉东省委，以取代1936年吉东特委破坏后成立的下江、道北、道南3个特委。吉东省委书记为宋一夫，委员有周保中等8人。抗联第五军成立后，除留一部分坚持宁安老区的斗争外，军的主力向中东铁路以北的穆稜、密山、依兰方面转移。1937年春，第五军的主力已集结于以刁翎游击根据地为中心的牡丹江下游地区，开展了大规模的抗日游击战争。1937年3月，第五军还会同抗联第三、第四、第八、第九军各一部，围攻依兰县城，并于3月20日占领大部分城区。新建的抗联第四军主要开辟宝清、富锦

^① 岸正之助：《匪区——东边道开发调查》。岸信介：《啊！满洲》，满洲国顺集刊行会，第402页。

新游击区，其一部也曾会同抗联第三军远征铁力、海伦。抗联第七军，主要是扩大了虎、饶老游击区，开辟了富、同新游击区。

抗联第三军和第六军，是1936年8月和9月，分别在东北人民革命军第三军和第六军的基础上改编而成。在这之前，1936年1月下旬，会师于汤原的东北人民革命军第三军、东北抗日同盟军第四军和汤原抗日游击队总队，以及自卫军、救国军等各军领导人赵尚志、李延禄、夏云杰、张寿篈、谢文东、李华堂、冯治刚等，在汤原吉兴沟，举行了东北反日联合军军政扩大会议。会议决定组织东北反日联合临时政府，成立东北民众反日联合军总司令部，推举赵尚志为总司令，张寿篈为总政治部主任，李华堂为副总司令。这个总司令部，实际是北满抗联总司令部，在统一指挥北满抗日活动和统一安排北满抗日武装的给养、人事干部方面起了重要作用。新改编的抗联第三军是抗联中最大的军，军长赵尚志，政治部主任冯仲云，下辖10师，共6000人。抗联第六军，原来夏云杰任军长，张寿篈代理政治部主任，冯治刚任参谋长。1937年2月整编后，戴鸿宾任军长，兰志渊为政治部主任，参谋长未变。下辖4个师，戴鸿宾兼第四师师长。统一领导北满抗日游击战争和抗联第三、六军的中共北满临时省委，于1936年9月18日成立，其前身是中共珠河、汤原中心县委和第三、六军党委。省委常务书记为冯仲云，省委执行委员会赵尚志任主席。抗联第三军本来是辗转战斗在松花江两岸的广大地区，从1936年末起，根据省委决定，以主力西征小兴安岭一带的铁力、海伦、龙门，进入黑嫩平原，开展游击战争。配合西征的还有抗联第五、第四军的各一部。从1936年9月到1937年4月，抗联第三军，转战数千里，在北满几十个县与日伪军进行百余次战斗，毙伤俘敌千余人，攻占城镇20余座，粉碎了日伪以汤原为中心的多次“讨

伐”，并开展了黑嫩平原的游击战争。抗联第六军主要以汤原为根据地，开辟依兰、桦川、富锦等新游击区。1936年11月23日，抗联第六军创始人、军长夏云杰在汤原西北部活动时，遭敌袭击，负伤后牺牲。继任者戴鸿宾军长后将第六军扩大为5个师。1937年5月18日，在日伪的春季“讨伐”之后，第六军还取得夜袭汤原城的重大胜利，给敌人以很大震动。

抗日联军第一至第七军都是中国共产党领导的抗日部队，而抗联第八至第十一军则是与中共保持统战关系的抗日武装。由于他们都是抗日的，又愿意接受中国共产党的领导，于1936年夏至1937年秋，先后被纳入抗联的序列，中共向各部派了党代表和政工干部。这些部队政治工作薄弱，成份稍杂，组织上动荡、变化较大。抗联第八军，原为1934年3月依兰县土龙山农民暴动后的民众救国军。改编为抗联部队后，军长谢文东、副军长滕松柏先后叛变。该军主要在依兰、方正、延寿、勃利等地开展游击战争。抗联第九军军长李华堂，原为吉林自卫军营长，他所拉起的中国自卫军吉林混成旅第二支队遭受严重损失时，曾得到人民革命军第三军的帮助。改编为抗联部队后，辖8个师，由800人发展到2000余人，活动于依兰、方正、勃利一带。抗联第十军的前身是汪雅臣反日山林队“双龙”队，1936年初被珠河中心县委收编为东北人民革命军第八军，1936年冬又被改编为抗联第十军，军长汪雅臣，政治部主任王维宇，副军长齐云禄，共千余人，活动于五常、苇河、舒兰一带。抗联第十一军的构成与前几个军都不同，实际是由依兰县驼腰岭金矿工人组成。1933年6月，他们起义后建立以祁致中为首领的反日山林队“明山队”。1936年5月被改编为抗联独立师，1937年10月正式被编为抗联第十一军，军长祁致中，政治部主任金正国，参谋长白云峰。辖1个师3个

旅，千余人，活动于依兰、桦川、富锦、集贤一带。

抗联的11个军，共30000余人，活动于东南满、吉东和北满三大游击区，游击区覆盖70余县，建立了许多根据地、基地、密营，与东北人民建立了血肉联系，博得了广大群众的极大同情与支持，从而得以在极端困难的环境下，持续多年与日本侵略者作战，取得了武装抗日斗争的一系列胜利，当然也付出了不可弥补的巨大牺牲。据日伪统计，1932~1937年，抗日部队共出动131423次，抗日武装人员共出动21058011人次，按年计算，同期间从377万人次，增加到1035万人次。后者是前者的3倍。^①东北人民抗日武装斗争，是艰苦卓绝的，意义重大的。它不但牵制和打击了敌人，而且也完全打乱了敌人的侵略计划。^②

“治安肃正三年计划”

1935年，日本侵略者即震惊于抗日武装的重又增长，而变本加厉地进行杀伐。进入1936年，随着东北抗日联军的建立，关东军又抛出了“治安肃正三年计划”，图谋从1936年4月起以三年为期，“彻底肃清、镇压”抗日联军和“在满共产党”。“计划”本身也反映了过去几年间“讨伐”镇压的失败。由于极其广大地区都被抗日武装所占领，或化为游击区，“三年计划”突出地把着眼点放在地盘争夺上，或者说是实行分区的“肃正”，并把“治标”和“治本”、“思想工作”密切结合在一起。所以，“计划”虽然是属于关东军的，但是它要求日伪军警宪特和有关

① 伪满治安部：《满洲国警察史》，第321页。

② 本节的叙述多处参考：军事科学院军史部《中国抗日战争史》上卷，解放军出版社1991年版；抗联史编写组，《东北抗日联军斗争史》，人民出版社1991年版。

日伪机关全都上阵，并反复强调“彻底进行”、“长远观点”和“永久性成果”。“三年计划”是全局性的总体计划。各个年度以至季度，关东军以及日伪军警宪部门都炮制和实施更为具体杀伐镇压计划。

“计划”的第一年，即1936年4月至1937年8月，“主要肃正地区”规定为：“国境地区特别是能彻底封锁的国境地区”；“国防上及工业重要地区”；“铁路沿线（包括预定线）、县城和主要城市附近需两天路程之地区”；“匪化地区及可压缩匪团的游击区”；“省县城附近地区”；“除以上各项外，军（指关东军）将重点放在滨江、吉林、间岛、三江（特别是饶河及汤原等县）等省”。当时，关东军所辖部队，除各独立守备队外，还有第一、第九、第十二师团，独立混成第十一旅团，和其他部队。他们分别配置在北、西北、西和东北、东、中、东南、南等各“防卫地区”内。其中“北、西北、西各防卫地区，其全区或大部地区的治安维持工作，已逐渐由满军警自己负担”，而其他“防卫地区”，至少到1936年夏秋是以关东军为主导，日伪军警共同进行“讨伐”和镇压，只有所谓“北部东边道”，即第一、第二独立守备队分驻地，在1936年秋交给了伪满军政部最高顾问部，由伪军进行所谓“独立大讨伐”。

关于所谓“治本”与“治标”的配合，和“讨伐”镇压的方法，在1936年《第二期关东军治安肃正要领》中规定的尤为具体。第二期为8至11月。这一期“肃正”的主要地区，仍为伪满东部地区，特别是东边道、三角地带和伪滨江、三江两省的松花江以北地区。但“要领”的各项规定也适用于“其他地区各项工作”。“第二期”的前半期，即青纱帐起的8、9月份，以“治本、思想对策”为重点；后半期，即初冬叶落的10、11月份，以

“治标”为主，即进行“讨伐”、逮捕等，同时也“使治本、思想工作立即跟上，与之相适应，以期彻底做好治标工作。”关于“治本”，“要领”要求，本期的重点是“匪民分离”和“掌握群众”。前者的措施包括：组成“集团部落”，设置无人区，修筑警备道路和通信网等；而后者则是建立伪自卫团，建立固定密探网等。关于“治标”，就是“积极坚决地进行大讨伐和大逮捕。”为使抗日军“无存在之余地，通过捣毁匪贼山寨、组成集团部落、划定无人区、分离匪民等工作，使其孤立，然后进行讨伐，加以歼灭。同时，用盘查、逮捕等手段，剿灭潜伏、逃亡的匪徒。”这些虽然都不是什么新招法，但是，“要领”强调“要特别警惕跟随匪贼的行动而行动”，也就是不让抗日军的活动牵着鼻子走，而“要主动积极地确定肃正地区，将治标、治本、思想各工作结合起来，全力彻底消灭匪贼，特别要摧毁共匪地盘及盘踞地”。^①关东军的这一套究竟有多么大的效果，或者说能够在打多么大的折扣下付诸实施，值得研究。最基本的事实是：当时东北抗日联军各部不仅相继建立，而且正在发展壮大，“三年计划”经过一年的推行，在第二年度，即1937年继续把滨江省、间岛省、吉林省、安东省及奉天省东部作为“肃正的重点”，此外，还要对抗联部队云集的伪三江省进行“特别工作”。^②

“三年计划”的目标之一是，除伪三江省外，伪满全域都准备以伪满之力“独立担任肃正工作”。1936年秋至1937年初的东边道独立大讨伐就是为实施这一计划所采取的重要步骤。这对伪军来说还是破天荒第一次。但是，实际指挥者是伪军政部中由关

^① 1936年7月23日《昭和十一年度第二期关东军治安肃正要领》。《日本帝国主义侵华档案资料选编》第4卷“东北大讨伐”，第215~219页。

^② 1937年8月8日《昭和十二年度关东军治安肃正计划要纲》。《日本帝国主义侵华档案资料选编》，第四卷“东北大讨伐”，第227~229页。

东军军官组成的顾问部，该部特以最高顾问、关东军少将佐佐木到一为首组成了全部由关东军军官构成的“讨伐指导部”。“讨伐”区域为东边道北部，即辑安、通化、柳河、辉南、金川、濛江、临江、抚松、长白和磐石东部、桦甸安图两县南部。动用的部队，除伪第一军管区的部队外，还有伪军政部直辖的伪靖安军主力、伪国都宪兵队1个连、伪第三军管区所属混成教导旅和混成第十四旅、伪第五军管区所属的索混成旅和第五宪兵队约1个连等。这些部队，分别部署在临抚、辑安、通化、金柳、濛辉等5个地区，每个地区都拥有两个旅以上的兵力，受地区司令部指挥。“讨伐”目标明确地规定为吴义成、金日成部和王凤阁抗日救国军。所使用的战术是：“将所需兵力，高度分散配备在各县，同时以一定之兵力担任游击讨伐，使匪贼无存身之地。”^①“讨伐”分秋、冬两期。从1936年10月25日正式开始的“秋季讨伐”，主要是通化和辑安两个地区的部队，分别“讨伐”吴、金部和王凤阁部，以后者为主。为此，“讨伐指导部”特由各地区部队选拔了游击部队。对“讨伐”主要对象王凤阁还悬赏5000元。伪满宪兵特别编成便衣队，进行搜查和暗杀。在通化市还杀气腾腾地采取所谓“净化”措施，发放居民证，围城设立检问所。然而，这场以同年11月25日为终期的、可谓周严的“大讨伐”却以失败而告终。尽管“讨伐指导部”也罗列不少“战果”，但是主要“讨伐”目标王凤阁及其救国军依然存在，充其量是和一些抗日山林队一道受到较大损失。^②

① 1936年7月23日《昭和十一年度第二期关东军治安肃正要领》。《日本帝国主义侵华档案资料选编》，第4卷，“东北大讨伐”，第215~219页。

② 据1937年4月20日佐佐木到一《昭和十一年度满军独立北部东边道秋冬季讨伐综合报告》载，在此期间，战斗350次，参加“讨伐”者累计8890人，杀伤1000余人，覆灭山寨300余处，东边道抗日武装减少到2000人。“报告”还列举了被捕者、被杀者和投降者。

由于没有捕捉到王凤阁的抗日救国军，12月1日开始的“冬季讨伐”，便以吴义成、金日成及其部队为主要“讨伐”目标。随之临抚和临抚以西地区成为主要“讨伐”地区。“讨伐指导部”的意图是，把吴、金和抚东其他抗日军，统统围歼在抚松县中部，不得已时把他们围困在长白县的无人区，“使之自灭”。所使用的部队，包括李寿山的混成第三旅和靖安军支队，他们都是伪军中最为凶恶的部队。两军经过一个时期的周折之后，1937年1月16日，在预定的作战地临江东北三道沟里大洋岔开始总攻时，结果落得个抗日军“所在不明”，“分散绝迹”。实际上，抗联已转移北上。总之，活动于临、抚、长三县的抗联等部队，虽然因连遭围剿而不得不化整为零，并遭受某些损失^①，但是并未溃散，他们主要转移到抚松以东地区和长白山南麓。而且转移后的抗联各部仍在继续打击着敌人。^②

东边道独立大“讨伐”的唯一“战果”是，最后终于捕杀了王凤阁。1937年1月6日，再度围剿王凤阁的行动即已开始。1月中旬临江之东的大围攻扑空之后，“讨伐指导部”更集结兵力，向辑安第四区和辑安同临江交界处这两个王凤阁救国军“可能潜伏”的地区，进行搜索。这时，连续数年、特别是东边道独立大“讨伐”以来屡遭围剿之苦的王凤阁部已所剩无几。但是，哪怕只剩王凤阁一人，日本侵略者也认为是心腹大患。按1937年1月6日“讨伐指导部”下达之第二次“讨伐”王凤阁计划，竟然动用了除临抚以外的全部伪军。2月初，根据各方面情报，判断王凤阁部仍潜伏在原根据地后，“讨伐”更加猖狂起来。连续追

① 1936年12月21日，抗联第一军二师、第二军四、六师在长白县七道沟一带与伪靖安军交战，二师师长曹国安不幸牺牲。但是，1937年2月中旬敌人还是赏赐曹国安。

② 如抗联二军六师于1937年2月20日在抚松县城南与伪靖安军交战。

剿王凤阁部达5个月之久的伪满桥本宪兵队，“构成了更加严密的谍报网，努力弄清他的所在。”^①然而一直到8月27日才在辑安六道沟捕获了王凤阁及其妻儿，并捕杀20余名救国军人员。1937年4月6日，王凤阁被惨杀在通化城东玉皇山下。日本帝国主义极其狠毒，在用战刀砍杀了王凤阁之后，接着竟又枪毙了王凤阁的妻子和只有几岁的儿子。

在东边道北部进行伪军独立大“讨伐”的同时，以独立守备队为主导，日伪在东边道全域还实行了所谓“特别治安肃正”。结果，不仅使抗日武装力量遭受损失^②，东边道广大人民群众也深受涂炭。进行“讨伐”的5个小区，光是被夷为无人区的面积，就相当于当时伪通化省的三分之一。光是1937年就计划将“讨伐”区内的13000多户逼入所谓“防卫部落”。^③总数达一万数千人的10多个旅的伪军，给东边道造成兵祸达半年之久。只通化县就“有一万三千余名饥民”，其他各县情况亦然。^④人民群众所遭受的屠杀，更是触目惊心。特别像关东军参谋、伪军顾问小越信雄少佐，和李寿山的老搭档、日本浪人伊达顺之助这类妇孺皆知的杀人魔鬼，当时也参加“讨伐”，他们随意杀人，被杀者数以百计，他们甚至对着被砍下的人头饮酒作乐，将挖出来的人心寄回日本。^⑤

① 佐佐木到一《昭和十一年满军独立北部东边道秋冬季讨伐综合报告》。《日本帝国主义侵华档案资料选编》，第4卷，“东北大讨伐”第289~291页。

② 例如，1937年2月11日抗联第一军一师在本溪县和尚帽子的密营遭日伪军包围，突围中一军政治部主任宋铁岩牺牲。

③ 《日本帝国主义侵华档案资料选编》，第4卷，“东北大讨伐”，第335~336页。

④ 伪满治安部，《各地治安工作调查报告集》，1942年7月。

⑤ 1954年5月4日赵秋航笔供。《日本帝国主义侵华档案资料选编》，第4卷，“东北大讨伐”，第342~345页。

白色恐怖愈演愈烈

1936至1937年，日伪警宪还把对爱国人士和群众的逮捕、镇压推到高潮，这种白色恐怖也是所谓“治安肃正”的重要内容，对武力“讨伐”则是直接的配合。但日伪的白色恐怖并非始自此时，而且它贯彻于伪满的始终，愈演愈烈。对于维持殖民统治，它是基本的暴力手段之一。

伪满洲国出笼不久，1932年9月12日，一下就抛出了三项镇压人民的反动法律：《暂行惩治叛徒法》、《暂行惩治盗匪法》和《治安警察法》。这就给日伪警宪以极大的镇压权力。在伪满洲国，自不待言，所谓“叛徒”是加给反满抗日者的罪名。至于所谓“盗匪”，按《暂行惩治盗匪法》规定，是指以强暴或威胁手段企图夺取他人财物的聚众或结伙。^①可以看出，要害不是“夺取他人财物”，而在于“聚众或结伙”。^②也就是说，只要日伪警宪认为你是“聚众”或“结伙”，即使扣不上反满抗日的“叛徒”罪名，也可以随时按“盗匪”治罪。至于《治安警察法》，更明确规定禁止秘密结社。而且，由于该法的实行，人民群众不但随时可能遭到逮捕，甚至还可能随时招致杀身之祸。

《暂行惩治盗匪法》第七条、第八条都规定了伪军伪警的“临阵格杀”和“裁量处置”。两者实质是一样的，都是直接屠杀。伪军伪警可利用该法所规定的“事态紧迫不允许犹豫”，而把这种屠杀扩大到无边无际。难怪关东军后来把镇压共产党及其外围组

① 此为《暂行惩治盗匪法》的第一条规定。

② 1932年11月24日伪满司法部第363号训令解释：聚众是指多人集合并呈随时增加之势，结伙，按本法系指2人以上，与刑法第338条4款规定的结伙不同。

织的所谓“严重处分”即就地屠杀权，从关东宪兵队扩大到所有日伪警宪，那不是偶然的。日伪军警宪特所实施的“临阵格杀”“裁量处置”和“严重处分”，以及秘密屠杀等等，证明了伪满洲国之初所颁布的《人权保障法》的彻头彻尾的虚伪性。

伪满时期，殖民主义的高压统治日甚一日，人民被剥夺一切自由，生命甚至难保。即使如此，各阶层人民以各种各样的方式反抗侵略者，表现出了爱国主义的高尚情操。即以1933至1936年的情况来看：1933年5月8日，哈尔滨发生了反对日本宪兵殴打乘务员的电车工人大罢工，市总工会领导，300多名工人参加，后被日伪欺骗和镇压，但震动和影响很大。伪满时期，厂矿、特别是日资企业的劳资关系也日趋紧张。工人阶级的大多数，在高压统治下以消极怠工等方式对抗侵略者。但是，也有一部分工人群众，与日伪势不两立，逃走，暴动，投身于抗日斗争。1933年2月，伪军占领依兰县东部驼腰子金矿后，日夜监视工人的行动。而当时年仅18岁的矿工祁致中（时称祁宝堂）目睹祖国山河破碎，决心抗日救国。1933年6月某日，他率领同盟兄弟7人用托人买到的两支手枪，一举歼灭日军7人护矿队，然后拉起“东北山林义勇军”。在这支抗日军的基础上，后来发展成为抗联第十一军。而祁致中坚持战斗到1939年，最后为国捐躯，成为工人阶级投身抗日武装的杰出代表。

伪满前半期，最驰名的农民起义，莫过于土龙山农民暴动。1934年3月8日，依兰县土龙山一带2000多农民，在保董谢文东、甲长景振卿率领下，为反对日伪占地、收枪而举行武装暴动。3月9日农民武装队伍占领了太平镇伪警察署，解除了伪警的武装，击毙10名伪军。10日，前来解救太平镇的由关东军第十师团第六十三联队长饭冢大佐亲自率领的日伪军，又遭到武装农

民的伏击，结果饭冢朝吾大佐等17名日军和1名伪警被击毙，其余数十名全部被俘、缴械。堂堂的一位“皇军”大佐，竟被中国农民所击毙，简直给日本陆军丢了大脸。因此，日军立即以百倍的疯狂对土龙山农民进行血腥报复，10余个村屯被血洗，数百名群众受杀伤。但不屈的土龙山农民起义武装，却进而整编为“民众救国军”。在其影响下，依兰及其周围，各种抗日武装纷纷建立，云集依兰者即数以万计。后来，就是依兰的这支农民武装发展成为抗联第八军。的确，包括抗日联军在内，各路抗日军的主要成分都是农民，广大农村也是抗日武装斗争的主要舞台。正因为如此，农村的农民参与抗日救国运动的规模和人数，很可能高于城镇。各种反日救国组织在农村犹如雨后春笋，纷纷建立。例如，1935年在各地发展的“南满反日会”，其分支组织遍及盘石、伊通、双阳、桦甸、西安、辉南、濛江、金川、抚松、海龙、柳河、临江、清原、通化、桓仁、东丰、西丰等县。^①诸如此类的抗日救国组织很多，如“东北反日总会”、“东北抗日救国总会”、“东满中韩反日联合会”、“沿江协会”、“东满中高反日联合会”、“宁安反日总会”、“青年救国会”、“北满青年救国会”、“满洲反日青年大同盟”、“北满中国青年救国总会”、“下江救国青年会”、“农民协会”等等。^②广大农民通过这些组织，配合武装抗日斗争，从事各种抗日救国活动。所以，日本侵略者固然害怕抗日武装的发展壮大，更害怕成为抗日武装生存源泉的广大群众的觉醒与斗争。关东军都在惊呼：“三千万民众在精神上与匪贼（指抗日武装）无大差别者为数不少”。^③

① 1935年8月5日驻何岛日本领事致驻满大使南次郎第974号机密函。

② 见吉林省社会科学院日文档案抄件。

③ 关东军参谋部：《关于昭和十二年度秋季治安肃正工作概况》。《日本帝国主义侵华档案资料选编》，第4卷，“东北大讨伐”，第11~16页。

站在抗日救国斗争对立面的20余万众的伪军、伪警，其实也并非日伪方面的稳定、可靠因素。由于敌我斗争日炽，胸怀良知者接连调转枪口，站到抗日救国的立场上来。因此，事变以来，伪军警起义、哗变事件从未间断，并日趋频繁。仅以1936年6至12月为例：1936年6月9日午夜1时，筒子沟国境监视队连长率两个小队95人，携带武器，将日本军官神田上尉、重见中尉及日兵5人击毙，然后于同日上午9时入苏^①；同月25日，密山县当壁镇伪军混成第十一旅步兵第十五团一营三连王戈、宋凯玉等8人，击毙张准尉、高中士后，携械入苏^②；同年7月30日，驻满洲里伪兴安北警备军骑兵第八团初年兵8名起义外逃^③；同年10月4日，临江伪森林警察队一部分队员起义^④；同年12月18日，苏满国境21号界标驻军（驻平阳镇伪军1个排）20名起义^⑤；同年12月21日，临江县六道江伪警察署长、巡官苗德霖，在护卫通化宪兵分遣队长米冈准尉途中起义^⑥。遍设在伪满各地的监狱，也是拥有巨大能量的抗日斗争的“火药库”，时刻威胁着日伪统治，因为在伪满身陷囹圄者有相当一大部分是抗日爱国者、抗日军被俘者和遭受整肃的伪军伪警。^⑦他们只有砸碎枷锁才能获得

① 1936年6月9日密山宪兵分队长平野幸治致关东宪兵队司令官东条英机密高第92号报告。

② 1936年7月1日牡丹江宪兵队长中井传致关东宪兵队司令官东条英机牡宪高第154号报告。

③ 1936年7月30日海拉尔宪兵队长致宪兵队司令部警务部长电。

④ 1936年10月奉天地方委员会致中央警务委员会奉警第1号报告。

⑤ 1936年12月牡丹江地方警务统制委员会中井传致中央警务统制委员会东条英机牡警委第17号报告。

⑥ 1937年8月5日奉天地方警务统制委员会加藤泊治郎致中央委员会东条英机奉警委第196号报告。

⑦ 1935年伪满有新监狱23，新分监1，旧监狱103，新看守所20，旧看守所29，特区监狱1，特区分监1，及其他监狱计205所。被囚者22143名。

解放。1936年6月7日，延吉监狱发生暴动，50多被囚农民击伤狱长和狱警，夺枪出逃，分别参加了人民革命军和抗日义勇军。同年12月21日，齐齐哈尔陆军监狱也发生暴动，103人越狱外逃，他们虽然遭受逮捕或射杀，但对日伪统治者却是很大的震动和打击。^①

东北的广大青年学生和知识份子，除了像苗可秀、刘壮飞、白君实等这些投笔从戎、最后为国捐躯的优秀份子，和他们所领导的少年铁血军这样以知识份子为主体的抗日军的英勇斗争外，本书即将言及，也有越来越多的人，用适合自己的方式，以表示对日伪统治的不满与反抗。总之，在伪满洲国，侵略与被侵略，统治与反统治，这是不可调和的对立与矛盾。对于日伪统治来说，只有不断地强化统治与镇压，别无他策。

日伪的统治、镇压当然是面向全东北人民的，其中中国共产党的组织和成员却自始就是重点目标。伪满初期，中共党的力量还比较薄弱，据统计，中共满洲省委所属党员共有2132人。党的组织，除屈指可数的中心城市和主要铁路沿线城市外，在农村，只有磐石、珠河、汤原、宁安、饶河等才有。但是，作为抗日救国的领导和组织力量，至少在“七七”事变以前，除中共之外，没有其他。1933年4月11日至13日和5月6日，抚顺和吉林两个特支被破坏。1934年4月，又由于共青团满洲省委遭到破坏，而导致中共满洲省委、哈尔滨区委、吉东局，以及双城、长春、奉天、珠河、呼海铁路党、团和工会组织的一系列大破坏。但是，党的活动与工作没有停止，除继续组织武装斗争外，1934年9月满洲省委做出了关于工会工作的决定，把工人运动和抗日武装斗

^① 1937年1月25日齐齐哈尔地方警务统制委员会致中央警备统制委员会 齐警委第22号报告。

争结合起来，建立工人群众武装自卫队和工人义勇军，恢复“满总”和“哈总”等工会组织。这不能不引起反动政治嗅觉很灵的日伪警的注意，特别对于党的工作比较活跃和可称之为中国共产党领导的抗日武装摇篮的磐石和沈海铁路沿线，更格外注意。1935年8月5日至21日，日伪警宪在沈海铁路沿线连续逮捕8次，109人被捕，从而破坏了磐石县委、沈海铁路工会和反日妇女会等组织。^①同年冬又从磐石逮捕了数十人。这时，日伪军警宪更加明确地把政治镇压目标置于中国共产党，名之曰“思想对策”，与此同时，逮捕、镇压的范围也大大地扩大了。

伪安东省，是苗可秀等抗日英杰领导以知识份子为主体的抗日队伍，坚持武装斗争的地区，同时它也是知识界遭受镇压最为残酷的地方。两者是偶合，还是有其因果关系，还不清楚。事实是：1935年9月安东发生所谓救国会事件，事件株连到安东的小学教员、校长和其他人士，最后扩展到伪安东省的11个县，文教界以至工商界笼罩着一片白色恐怖。1936年11月，伪安东省教育厅长孙文敷等58人被枪杀，300多名教职员和工商业者被判刑。在这一事件前后，日伪宪警在沈阳还先后制造了“一分钱委员会事件”和“共荣学院事件”，使笼罩在伪安东省的恐怖，蔓延到了伪奉天省。所谓一分钱委员会，就是沈阳市部分文教、工商界人士，每人每天节约1分钱帮助贫困学生，使伪警宪疑为是共产党所领导的运动，乃从1935年10月开始大逮捕。后来株连到锦州、吉林、长春等地，在这些地方有58人被逮捕。共荣学院系私立学校，日伪警宪认为，学院以“共”字为名实属可疑，加以在该校还发现马列主义书籍，便开始镇压。1936年8月20日，学院

^① 1935年4月6日，日驻伪满大使南次郎致外务大臣广田弘毅公机密第528号报告。

创始人王殿玉被枪杀，许多奉天教育界知名人士被判刑。北满文教界的恐怖，是与上述各案几乎同时发生的齐齐哈尔民报社事件。起因是该社人员曾演出《母与子》等戏剧，和发表一些进步文艺作品。1936年6月日伪警宪从报社、学校、文教界逮捕了50余人。最后，2人刑讯致死，31人被判刑，5人被枪杀。另外，伪黑龙江省教育厅长王宾章也被牵连，并死于齐齐哈尔日本宪兵分队。与民报社事件相牵连，哈尔滨还发生了口琴社事件。日伪警宪认为知识份子经常出入口琴社，行为可疑。开始逮捕后，又株连到中东路电务段和三十六棚，共180人左右被捕，70余人受到各种惩处。

1936年，日伪的武力“讨伐”与政治镇压都是转折期。当年关东军制定的“治安肃正三年计划”明确把“大逮捕”也列入计划。要求日伪警宪机关须配合“讨伐”，肃清抗日武装活动地区，断绝抗日武装生路，迫使抗日武装“衰败以至溃灭”。从此，日伪警宪更加疯狂起来。1936年1月，关东宪兵队警务部长齐藤美夫在宪兵队长会议曾称：“逮捕对象之多超过了我们逮捕兵力之所及”。于是，日本侵略者发明了所谓“一齐逮捕”，即在指定时间，各地警宪机关同时出动进行逮捕。1936年3月，关东军还把“一齐逮捕”正式列入“治安肃正三年计划”，要求“一齐逮捕”前，进行“准备侦察”，“准备侦察”又分为“侦察”和“培养”；而“一齐逮捕”也分为“地方、地区一齐逮捕”和“综合一起逮捕”。^①上述民报社事件，就是“六一三”一齐逮捕的组成部分。当天下午3时，按关东宪兵队司令部的统一部

^① 关东宪兵队司令部：《关于昭和十一年四月至昭和十四年三月警宪施行之满洲国治安肃正大纲》，1938年4月10日，关宪作命第45号。《日本帝国主义侵华档案资料选编》，第4卷，“东北大讨伐”，第216～217页。

署，哈尔滨、齐齐哈尔、海拉尔、牡丹江等4城市，同时逮捕共产党员和有关者260人。最后，只哈尔滨一地就有15人被处死，30人被处无期徒刑或有期徒刑。^①1936年末到1937年初，日伪警宪还把“一齐逮捕”发展为出动大量警宪公开进行拉网式的大搜捕。例如：1936年12月中旬，奉天警宪在奉天宪兵队“管内”出动12649人，逮捕745人。^②1937年1月28日，伪奉天省再次进行城市全面大搜捕，出动日伪军警宪达38930人，逮捕2481人，其中竟有2331人捕因不明。^③显然绝大部分都是所谓可疑的无辜者。另据关东宪兵队统计，1936年4月至1937年2月，只10个月，日伪警宪就逮捕了38577人，送伪司法机关惩处的为10489人，所谓“严重处分”即就地屠杀者竟达4336人。^④

就在这白色恐怖推到顶峰的时候，伪满时期东北共产党组织最大一次破坏——“四一五”事件发生了。事情与前一章所说的长岛特别工作班破坏柳河县委有直接关系。最后是由于哈尔滨宪兵队埠头分队从1名慑于白色恐怖的党内异己份子获得党的交通线和哈尔滨特委情况，而导致了大逮捕。1937年4月15日，一天时间，哈尔滨特委、哈尔滨市委、奉天特委、磐石特委、下江特委，以及海龙、柳河县委等，全遭破坏。作为这一事件的继续，接着抚顺特支也遭破坏。1938年初日伪报载：在“四一五”事件中，共有482人被捕，85人被屠杀，64人被判有期徒刑，另有135人尚在刑讯之中。^⑤

① 1936年6月关东宪兵队机密档案第13号。

② 1937年1月12日奉天地方委员长加藤泊治郎致中央警务统制委员长东条英机奉警委第31号报告。

③ 1937年3月4日奉天地方委员长加藤泊治郎致关东宪兵队司令官藤江惠辅奉警委第195号报告。

④ 中央警务统制委员会。《思对月报》，第11期，中警委第186号。

⑤ 《满洲日日新闻》，1938年2月12日。